

第三卷 第七期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國父的民生史觀與威廉的社會史觀.....葉青

論三民主義新社會的心理基礎.....王書林

喬治亨利卑一地價稅學說述評.....丘式如

試論設計工作.....薩師炯

縣各級組織關係圖的研究.....張道謙

公務員異動之原因及其補救之辦法.....李宗義

論曹操之用兵.....徐德麟

先哲的勤政精神.....成惕軒

國父家世源流的新認識.....彭澤益

武昌首義殉難彭劉楊三烈士列傳.....張鏡影

研究學術的取材問題(讀中國之命運札記之一)蕭文哲

三民主義我半月刊

吳敬恆題



國父底民生史觀與威廉底社會史觀

葉青

「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深究馬克思的主義，……說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

(民生主義第一講)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批評馬克思底唯物史觀中創立了民生史觀；威廉（Karl Wittich）在批評馬克思底唯物史觀（據國父之說）中創立了社會史觀。這並不是偶然的事情。孫先生底民生史觀與威廉底社會史觀確有其密切的關係。

國父在「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中說：「數年前有一服馬克思主義之學者，研究社會問題，發現社會上之生計問題與馬克思學說有不符會之點。於是提出質疑，逐條並舉，徵求同黨解答。歷時一年之久，而應徵者無一人。乃將其著作公之於世，名之曰歷史之社會觀。其要點之大意有云：在今日社會進化中，其經濟問題之生計分配，悉當以解決民生問題為依歸云云。由此可知本國所謂民生主義之名詞，至今已為學者贊同矣。」他在這書所說的「服馬克思主義之學者」為何人？就是威廉。他底引證，很明顯地是以威廉底社會史觀證明他底民生主義，尤其與生二字。這是一看專談話底上下文便可知道的。

他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說：「近來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深究馬克思的主義，見得自己同門互相紛爭，一定是馬克思學說還有不充份的地方。所以他便發表意見，說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這位美國學者最近發明，是恰恰和本黨的主義若合符節。這便發明說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是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我們提倡民生主義二十多年，當初詳細研究

，反覆思維，總是覺得用民生這兩個字來包括社會問題，較之用社會或共產等名詞為適當，而且又切實又明確，故用這兩個名詞，不料歐戰發生之後，更顯更明，學問更進，馬克思的宗徒也發明了相類之點。由此足見本黨提倡民生主義，是正當社會進化的原理，不是時髦學者所說的人云亦云。」這話把前段話中的「服從馬克思主義之學者」即為威廉那一章，與以證實。關於國父說他的意思亦在以威廉的社會史觀證明民生主義及其與生二字之適當。這是他講得很明白。

我們看了前引國父這兩段話，可知他底民生史觀與威廉底社會史觀完全相同。請問「社會進化中……經濟問題……解決民生問題為依歸」，「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歷史的重心是民生是物質」，等等，那「一項不是民生史觀底根本命題呢？按前引第二段話從威廉的如次論句說：「照這位美國學者底主義，他說古今人類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解決生存問題才地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這所謂「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解決生存問題才地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又有那一點不是民生史觀底根本命題呢？總之，就國父引證的威廉底社會史觀看來，「國民民生史觀與社會史觀只有名詞底不同，內容恰相類似的」。所以我們無論從民生史觀或歷史研究或比較研究上說，都不能把威廉底社會史觀置之不理。我們應該介紹它。

威廉是「馬克思的信徒」，為甚麼要在唯物史觀之外提出社會史觀來呢

論三民主義新社會的心理基礎

王書林

歐季陶先生說：「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原理，全部包括在民生主義之內，其全部著作可總名之民生哲學」。又說：「三民主義的總結的目的，在對全世界由資本主義而發生之社會病，以全人類之共同努力，完成真正具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世界。就是要造成一個無黨、無派、無傾的世界。」

所以說：「建設之要在民生」，以建立民生主義的社會，不能單靠武力的革命手段。「純用革命手段不能解決經濟問題。」民生的問題的解決，當然要有正確的政策，同時也要有新社會的心理基礎。任何社會的締成，除了物質的條件外尚須有心理的條件，一羣人在一處時，未必即能組成社會，必須發生行為上的交互影響，因而引起個人的社會行為，始成爲一種社會。個人的社會行為的表現，採取了某一種方式，我們稱之爲對應的社會，這了另一種方式，我們稱之爲本主義的社會，據了又一種方式，我們稱之爲民生主義的社會。所以對應的社會，實事主義的社會和民生主義的社會的區別，不但在物質的條件上表示差異，並且個人的社會行為上，社會的心理基礎上表示差異。這種差異的根源，一部份由於政治的力量，一部份由於教育的力量。政治問題的解決，有時要採用武力的革命手段，但是說實不是治本的方法。教育問題的解決，必須採用和平的革命手段。以改革社會的心理爲目標，則新社會始能真正建立。所以建立新社會的秩序的手段，第一步以武力奠定政權，以政權來推行新社會的建設，第二步必須以教育來建立社會。易言之，新社會的產生可以用武力，新社會的建立必須用教育。總括之，可以在馬上得天下，不能在馬上治天下，中國國民黨應取得了政權建立了三民主義的社會，但是新的社會並未真正建立，新政治建設亦未開

始推行；教育力量之未配合，心理基礎之未確立，無疑的，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新社會的政治建設的目標，分開來說，就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易言之，「人各盡其所能各取其所需」。概括地說來，新社會的政治建設之唯一的目的就是「民生」。所以在民生主義的社會中，心理的基礎是人各盡其所能。論及人的能力，其發展通常被內外兩方面所決定。內的決定就是遺傳，外的因素就是環境。環境規定個人的能力的限度，並決其方向。外的影響，則供給發展的環境，並限制其進程。

人的能力爲大體而論，可分爲身體方面的力量，簡稱體力，和心理方面的力量，簡稱智力。體力的性質爲機械的；智力則是一種遠傳的可能性，依其性質，大致可分普通智力和特殊能力兩種。普通智力是有適應環境環境的能力，公同於人類所有的作業。不過，人的各種作業所需要的普通智力，在質上雖相同，在量上則不相同。特殊能力則祇特殊於某種作業，爲數甚多，彼此不相同，且與普通智力無關。人的任何作業若被這兩種智力所決定，而這兩種智力又沒有很大的相稱，所以兩個普通智力相同的人，一個人從事某工程則成功，從事於營業則失敗；另一個人從事於政治則成功，從事於工程則失敗。心理學中職業指導一門學問，即專事分析和測定人的各種能力，使從事於最相宜的工作。最相宜的工作必須要合於個人的能力，普通智力和特殊能力。工作和能力相配合，則人能盡其所能，工作效率和能力不相配合，太難或太易均使人失了興趣。太難使工作失敗，長期的失敗是以損壞學習的興趣，減低工作的效能，並大有損於心理的健康。低效

教育最注意於達到適應，即使一切要學習的工作與學習者能力相適合，使他成功的可能。成功使人對於工作生可憐之感，失敗使人對工作生可恨之感。一個要自己的工作，始能盡其所能；慢工作則能力不能發展。若工作太容易，則失了對於工作的興趣。對於工作本身的興趣，是較持久的動機。近代教育主張兒童所學習的事物，必須滿足兒童自身的要求。易言之，使學習者能盡其學習的需要。一切教材的選擇，學習環境的安排，必須適合於學習者之興趣，能力和需要。能力和工作的配合是各盡其所能之基本的條件。近代心理學對於能力的分析和能力的測量雖做了許多工作，惟完善的狀況尚遠。所以各盡其所能一句話，說起來容易，做到完其甚難。前一世紀的科學對自然的瞭解已有驚人的進步，至於人性的瞭解的開闢，尚極幼稚。科學的心理學的歷史尚不到六十年，在此六十年間，雖有長足的進展，惟與自然科學比較，相差尚遠。對於能力的分析和測量確是建立新社會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人類的智力經心理學者以科學的方法測量的結果，有一點很確定的結論，那就是人類的先天能力表示很大的個別差異。因此，天賦平等之說在心理學上終難找不到根據；在科學上祇發現天賦不平等的事實。在人類中，智力商數的分配大約如下：（智力商數是心理學中一個專用的數量，普通人的智力商數約在一百左右）。

智力商數	智力等級	百分數
七〇以下	低能	1
七〇至七九	近似缺陷	5
八〇至八九	笨笨	14
九〇至九九	平常的智力	30
一〇〇至一一〇	平常的智力	30
一一〇至一二〇	優秀的智力	14
一二〇至一三〇	很優秀的智力	5
一三〇以上	近似天才或天才	1

所謂低能，就是笨笨，他們在有利的情形之下或能維持其生活，但是後天智力與普通人平等條件之下難辦。我們知道智商在二〇分以下者，學校

教育對他完全無益；若體力充足，可以挑水；可以收曬乾的衣服拿到洗衣坊去，但是同時不能叫他將洗好的衣服拿回來；可以叫他在草地上或路上拾柴，柴，安置在桶內，智商在二五至三〇分左右者，可以叫他在花園中拔草，但同時能拔一捆草；可以叫他喂雞、兔、羊，但不能放羊或取牛奶；教育亦對他無益。智商在四〇分左右者，延長時間或可了解小學一二年的教學；可以叫他從樹上採取果子，不使果子受傷同時不將樹葉採下；可以管羊取牛奶；洗普通的衣服，做簡單的裁縫。智商在五〇分左右者延長時間可以讀到小學三年級；可以包製小而不具複雜的東西，或可讀學初級小學；可以管理常業務，但不能管教兒童；可以寫信看書，做簡單的預算。智商在七〇分左右者，或可讀學高小，至於中學畢業生的智商至少在一〇〇以上。大學畢業生的智商最低在一〇〇以上。

天賦不平等既是確定的事實，而這種不平等又限制人們對於社會的貢獻；則根據天賦平等之說，使個人自由競爭，必然造成社會上不平等的狀況。以個人自由競爭為出發點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必然有無數貧窮之人，我們不能說每個貧窮者都是心理缺陷的，但是智力低下，無力與人競爭，確是許多人所以致窮之一原因。會有人調查某城市失業者的智力，在愚笨等級以下者佔全體失業者百分之八十，而在全人類中，愚笨等級以下的智力，祇有百分之二十。一個人生下愚笨，本人不能負責，但是他的生活一樣要維持，所以在民主主義的社會中，不能提倡平等競爭；民生問題的解決，第一要具個博愛的觀念。

再則，利用競爭為動機，以發展人的才能，流弊甚多。競爭可分為與人競爭及與己競爭兩種。與人競爭雖可以促進人們學習，但是結果往往使有才能者變成懶惰習慣，因而不肯努力，不盡其所能；缺乏才能者則生妒忌猜忌之心，因失望而不努力。近代教育於是提倡與己競爭之法。所謂與己競爭者，乃使學習者知道自己的進程，逐日繪好自己的學習曲線，總使他存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之心。與己競爭而不顧他人的成績，確可使人盡其所能；但是舊代的社會是集體的生活，不顧他人是辦不到的。所以必須養成合作的習慣，以聯絡各個體的自由發展之結果。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人們的行為動機

不是合作，而是競爭；競爭的結果，因天賦的不平等而產生了階級的壓迫，再加以資產階級的制度，於是貧者益貧，富者益富。共產主義者也似乎看到社會的病態，乃提出共產主義。他達到共產主義的目的，則主張階級鬥爭，仍舊脫離了競爭。所以這理論說：「馬克思是社會心理學家，不是社會學專家」。民主主義則著重於合作，所以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目的雖相同，而心理的基礎和實行的方法則不同。新社會的建立，須要全人類共同努力，尤其需要天賦才能高者之努力，不是一階級能夠單獨完成的。合作尚不足，鬥爭則損失力量。鬥爭祇能解決政治的問題，不能解決經濟的問題。民主問題的解決，必須提倡合作的觀念。以合作為行為的動機，則各人的能力貢獻，因天賦的限制，雖不相等，惟在盡其所能一點上，則是相等的。有十分才能的人祇貢獻了九分能力，在競爭上看來，勝過了八分才能之人貢獻了八分才能；但在合作上看來，是未盡其所能。合作的習慣的養成，是民權社會之根本條件。

民主開闢不外乎由強和分弱。在生產能力上，人們是不平等的，倘無博愛之觀念，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貧富不均的現象，即使有才能者生懶惰之心，不能所能，以最少力量獲得生活困難，減少社會的生產力。在分配方面，人們不盡其能，資本需要競爭相等。若無合作的觀念，則各取其所需是根據得到的。人們有了博愛和合作的觀念，則有才能者盡其所能，不是為己，而是為社會，即「力雖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之義。國父提倡人生以服務為目的，這就是這個意思。歐李陶先生說：「中山先生的全人格以仁愛為基礎，一切表現，無不仁愛。有過人之智，而其智僅用於知仁；有過人之勇，而其勇僅用於行仁，可知雖即仁愛，絕無革命可言，民生為宇宙大德之表現。仁愛即民生哲學之基礎。」是這種仁愛觀念的培養，始能補救天賦不平等之現象。所以國父說：「願天主人之聰明才力有平等，而人之服務道德有平等，必可使之成為平等了」。民生主義的平等觀念，不是天賦平等，乃是服務平等。平等是自然的狀態，要補救自然的缺陷，我們必須培養人類博愛之觀念，以合作代替競爭為人們行動的動機。

人類智力發展遲滯的，但是其發展仍有賴於環境。不良的環境極易阻礙

的發展。教育的設施，就智力發展看來，要佈置適宜的環境，以發展兒童及青年的智慧，使其盡其所能。在佈置教育的環境時，第一要顯及發展的歷程。智慧的發展歷程，心理學者已有無數研究，表示兒童不是小的成人，其發展是繼續不斷的。近代教育家都提倡兒童本位教育，就是兒童研究的教育要顯及其發展之狀況。第二、要尊重自由的發展，尤其要尊重學術研究的自由。人們的智慧之差異甚大，能發展到學術研究其智慧必然遠勝於常人，即有遠勝於常人的智慧者，在研究新的東西（發明）時，其研究歷程，有時竟似編之逃出迷津，即心理學者所謂嘗試與錯誤的歷程。在這個過程之中，若無自由的環境，必然阻礙其發展。學術研究不自由，則學術永無進步，社會亦不能推進。在這一點上，近代英美民主國家，最令人欽佩。近一世紀，他們對於科學和文化上所以能有無數貢獻，即由於研究的自由。研究自由，則人們始能忠實於自己研究的結果。知識的誠實性是智慧超人之最高的美德，是「智」與「勇」之最高的表現。歐洲在中世紀時期，根據神本主義，以教權束縛思想自由，所以在此時期的歐洲，在思想上是黑暗時期。近代歐洲稱霸全世界，是思想自由的結果。自歐戰以後，獨裁政治興起，利用教權以束縛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我們的三民主義的社會中，必須尊重學術研究的自由，以發展人的能力，使其盡其所能，以貢獻於社會。

由上面的討論，我們的結論是民主主義的社會之心理基礎，是各盡其能。要達到各盡其所能，第一要研究能力的本質，因為明瞭了能力後，始能使工作與能力配合，盡每個人的最大的「能」。研究能力的科學是心理科學，不是有智學，正確的智學，必須根據於科學的知識。第二要培養博愛之觀念。人類的天賦能力是不平等的。自由競爭必然的因自然不平等而造成社會的不平等。在不平等的社會中人們是不能盡其所能的，實際上許多人亦必不盡其所能。根據了博愛的觀念，則每個自然要盡其所能，因為能力的貢獻，不是為己，而是為社會。第三、要提倡合作的觀念。合作的觀念是補救自然的不平等之狀況。競爭是利己的，合作是利他的。第四、要尊重學術研究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自由是發展最高的智慧之惟一合理的環境。智慧是先天性的領賦，但其發展仍有賴於環境。不適宜的環境，常常阻礙智慧的發展的。（完）

喬治亨利單一地價稅的述評

丘式如

「美人喬治亨利，主張土地公有，其說風行一時，為各國學者所贊同，……原夫土地公有，實為精確不磨之論。人類發生以前，土地也自然存在，人類消滅以後，土地必長此存留。可見土地實為社會所有，人於其間又惡得而私之耶？……是故喬治之學說，實深合於社會主義之主張」。

(國父：社會主義之派別與方法——民國元年發表)

一、導言

美人喬治亨利，是單一地價稅學說發明人。(補稱單一地)自從喬治提倡這學說以後，雖有未步及到的人，但也有不少同情的人。

如從他的著作翻譯者，德國、法國、瑞典、丹麥、挪威、意大利、荷蘭、西班牙、俄國、匈牙利各國，都有譯本，英文版本則在十種以上。歐美報紙更以連續篇幅，登載亨利的學說，銷行的冊數，據開在二百萬冊以上，有論政治經濟的書籍，以此書銷行最廣。我國始有馬志林教授譯為中國文，最近復有錢觀光先生所著「亨利喬治學說之研究」。

再從他的學說運動言，則學說所編「單一地價稅」的統計，在美國所發行的全國性的單一地價稅運動機關及團體，共有六個，而散在美國各洲的單一地價稅組織，則有六十四個，宣傳單資助的刊物，則共有十九種。在各國所發行的單一地價稅組織，計西班牙一，丹麥一，瑞典一，挪威一，德國一，南斯拉夫一，新西蘭一；而宣傳刊物，則英國一，澳洲三，丹麥一，德國一，挪威一，西班牙一，阿根廷一。英國的團體組織，名曰「國際地價稅及自給貿易同盟」，設於倫敦，主旨在宣傳喬治學說，曾召集五次國際會議；第一次舉行於西班牙；第二次舉行於英國牛津；第三次於一九二六年舉

三民主義半月刊

行于丹麥京城，出席代表達二十六國；第四次于一九二九年舉行于英國曼徹斯特，出席代表有二十四國；第五次于一九三六年舉行于倫敦。

此外，英人曾五度邀請喬治赴英演講。當第三次在蘇格蘭演講，當地兩希爾侯爵，曾發表一文，批評喬治學說為不合正義，題曰「當金山之聖人」。喬治即為文答辯。蘇格蘭土地恢復同盟，將二人辯論文章，合印為一小冊子，名曰「貧富與聖人」，引起蘇格蘭各界的注意。一八八六年夏，紐約中央勞工協會，推喬治為紐約市長候選人。當地地主資本家和保守黨人，都十分忌憚，有如革命的降臨。選舉結果，喬治與未獲勝，但得票占第二位，共六八、一〇票。紐約赫爾士報曾評論這次選舉說：「在本市之內，發現一新政黨。此黨既無固定的組織，也無堅實的經費；且其領袖人物，對於政治工作，亦無經驗。但是在這次選舉中，他們的候選人所得的票數，幾與最近數年來現在各政黨候選人所得的票數相等，此實值得吾人嚴重的注意和研究」。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贊美喬治的學說說：「此種方法，可謂已達到完美的程度。此外，實難再有更公平，更實在，更和平的解決辦法」。美國陸軍部長塔夫爾則謂為「在余輩生之中，認為最偉大著作之一。拙對於世界思想的巨大影響，非選時代任何作者所說比擬」。杜威博士認喬治為世界大賦

社會學家之一，並謂：「自柏拉圖以至喬治亨利，世界上偉大之哲學家，不滿十人，屈指可數。無論其畢業于任何高等學術機關，如對於此美國大思想家之理論貢獻，沒有深刻的了解，不能自稱為在社會思想上曾受教育者。」

喬治對於喬治學說，也相當的重重，他說：「喬治亨利之學說，深合于社會主義的主張，而欲求生產分配之平均，亦必將土地收回公有，而後始可謀社會永遠之幸福。」

二、思想的背景

喬治于一八三九年生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之菲列德爾非亞，當英人瓦特發明蒸氣機後的第七十五年。他的父親，係菲城稅關的書記，而子女共有十人，所以家產經濟狀況，並不充裕。他十三歲入中學，祇讀了約五個月，因家產經濟困難而輟學了；翌年，就在一家磁器玻璃出口公司做學徒。

從他十四歲那年做學徒起，到他的名著『進步與貧困』出版那年止，前後相歷二十四年。在這二十四年當中，他曾一任輪船前舵水手，一任輪船管庫員，三任排字工人，一任礦米廠學徒，兩任礦師，二任報館訪員，四任報館編輯，一任通訊機關，一任民主黨加州代表大會秘書，一任英氣派說書員，一任舊金山公共圖書館董事會秘書。由喬治的家境說，是貧苦的，由喬治的經歷說，是波動的，我們可以知道他已飽嘗了苦悶的滋味。但喬治保有志青年，總是不斷的和命運之神鬥爭，常常從工作餘暇中去補習或自習，以補充自己學校教育的缺陷。

當他充任輪船前舵水手，年纔十六歲，目的地是澳洲和印度。動程的時候，他想到澳洲和印度一定是個光明地方；但到達了目的地一看，街市雖然繁華，窮人却到處都是，這給他的印象很深。

他于二十二歲那年結婚，結婚那天，身上只有銀幣一枚。當他第一個兒子出世，全賴其妻與首飾維持家用；到了他第二個兒子出世，連寶飾食物也統統沒有了，真是窮到了極點了。

開始于英王喬治三世而擴及于人類全體的工業革命，對於新興的英國，亦和各國一樣，有其利亦有其害。英國是新興國家，且因脫離英國高壓而獨立的緣故，崇尚自由的思想，更加濃厚，所以工業革命給予英人的恩惠，也就不會比英國的獨色。現在將喬治學說及英前的英國所受工業革命的影響，舉出幾點，分述于下：

一、機器發明——英國自工業革命，所有英國的紡織鋼鐵各工業及其他重要的商品，都獲得了各國之利，為保持其密商防別國和她競爭，所有新機器，新機噐及新工廠，都禁止出口。但是有一位英人瓦特(James Watt)，係曾在英國下特頓特紡織工廠作過工的，受了喬治亨利德爾非亞會社領袖奇巧技師廣告的誘惑，就到英國去了。到了一八〇七年，英國就有了四家以蒸氣機動的紗廠。一八一四年，也設立了用原動力的機布機。一八二八年，又設立了用原動力的毛織工廠。一八四六年，更發明一種織衣機。鐵工業則以喬治的故鄉為中心，有煤爐，壓機，煉鋼爐，及製鐵等。收穫機器，則是在一八三三年所發明的。

二、交通的發達——一八〇七年，有名的汽船克勒芒(Clermont)正式下水。一八一四年，斯普芬孫(Sperdy)作成了一對火車頭。一八三一年，開始有了鐵路。一八二五年，工程困難遠過巴拿馬運河的伊利運河，也正式竣工。一八五〇年，聯邦國會撥給伊里諾斯一大批土地予其公司，助其建築芝加哥開羅鐵路；另撥大批土地予阿拉巴馬及密士失必亞鐵路。電報於一八四四年發明，海底電線則於一八五七年。

在這樣的情形下，美國人的生活，有什麼變化呢？先說勞動階級的生活來說，俾其德(Chas. D. Babel)和巴格利(Barnum Child)會這樣說過：「因為工人的數目太多，許多悲慘的事情，也隨着發生了。工作的時間很長，往往由太陽出來直到太陽西下，都無剩餘時間精力作別的事情。如果一個雇生的事業失敗，工人因無權力處分雇主的財產，只好忍受失去工資。即在不時，工資常不能按星期發，甚至於不按月發，並常發給價值不足的紙幣，或兌現時要折扣的儲蓄券。工人如結合罷工，或組織同盟，以期增加報酬和縮短時間，那就要受罰金或監禁的刑。工資是很低的，據一個實際的歷史家說，平常像伐木及掘泥灰土的一類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得七角五

分，是很有福氣的了。一到冬季，有很多人，雖每天工資三角七分，甚至二角五分，都喜滋滋的；尚有許多，祇求有飯吃有屋住就滿足了。在大路及運河的工人，夏季為每月十五元，食住在內，冬季則常減至每月五元。鄉人的工資更低，是可憐的；雖說當時的生活較現在低，但比較起來，實遠不如現在。在這種情形之下，窮慘的現象是常見的，尤其是大城市中。其次，我們再來談談勞農階級的生活情形？因為當時美國是新聞開闢的世界，土贖人稀，美政府為開發荒地計，常以很大塊的公地，以極廉價分賣予私人公司和投機家；實際農人要得土地，須向私人公司和投機家購買。美政府雖有採取低價售地與農民和讓農民無代價取得西部小塊公地的辦法，但常被土地投機家和私人公司的欺詐手段所破壞，於是土地投機家和私人公司，常常佔有土地數百萬畝的。如以鐵路公司為例，美政府所給予牠的土地，有建築鐵路一哩，就准佔有土地二五、〇〇〇英畝的。因為這種種的緣故，失業的人便很多，祇紐約市一市的失業救濟費，每年就用到幾萬萬元。

喬治亞于工業革命後的七十五年，到了他年紀長大而智識日進的時候，就違背工業革命狂潮到邊奔放的時候，一方面想起自己個人的親歷痛苦，一方面看到成千成萬的貧困慘狀，自然要發生同情心，因而有改革的志願。英國大哲學家斯賓塞，于一八五〇年出版他的社會學一書裏面，有一章談到土地問題，主張土地應歸國家所有，不能歸為私有，才能使每個人都能得到使用土地所有權的權利；而使用土地的人，都向國家納稅。這樣，人人都是地主，人人都是佃戶。喬治未讀此書以前，他對於當時美國土地權的分配制度，本已認為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根源；所以自他讀了此書以後，就得到更多的啓示和激勵。

喬治曾三度下獄于工人，又曾二次擔任裁縫訪員，並曾擔任報館編輯，還兼理工作，雖然困苦，但很多機會閱讀到各種各樣的新聞，也很多機會接觸到社會各階層的人去，尤很多機會奔走各方去實地考察和體驗。他由此明瞭了一個社會開發前和開發後的不同情形，他也由此認清了勞工生活貧困的實際現狀，他並由此看清了土地投機家如何地租和地價高漲的真實事實，觀察到現狀和現狀的根源，以及工人生活學說的完成上，有很大幫助的。

三、學統的完成

喬治于二十六歲那年，開始寫作。

一八六七年，喬治擔任舊金山時報的經理編輯，曾寫一文曰「鐵路給予我們的是什麼」。文內說明鐵路的完成，可以促進人口增加，地方繁榮。但是這種現象，只有利于小部份人，徒使這大部份人更窮更富；至於其他大部份人，即特勞動為生的，將更難於謀生，日趨貧困。

喬治卅二歲那年，對於財富日增而貧窮亦日增的問題激辯，他認為係在土地權不公平分配上，因此寫了一本名叫「吾人之國家的一州」，土地與其政策」的小冊子，發覺批評政府給予鐵路公司大批土地的失策，加州允許私人佔有廣袤土地的不當。他提出了一個土地政策，主張政府的一切費用，都完全出自土地。其法，是廢除工業生產上的各種租稅，實行單一地價稅。所謂地價，並不包含地面上改良物的價值，而是土地的純價值，喬治的意思，以為照這個辦法，就可使佔有土地的無利可圖，而願意出賣土地，同時工商各業都無租稅，可以自由發展，財富自然大增，於是失業危險能夠免除，就無再受窮苦的痛苦了。

一八七七年，美國各州發生工業恐慌，失業的人更多。喬治意欲探求其根本原因與救濟辦法，就從事起草他的名著「進步與貧窮」一書。適舊金山公衆圖書館成立，他被推為該館秘書，也容易翻查材料，所以到了一八七九年三月，該書就全部脫稿。牠的要旨，可以歸納為土地私有的弊害，地租增加的原因，時人救濟政策的錯誤，根本救濟貧困的單一地價稅政策四項：

(甲)土地私有的弊害

土地是公共使用的。後因部落的大權操于酋長和軍人的手上，任意壟斷公地；並以部落戰爭的發生，被征服者的土地，為征服者所瓜分，歸為私人所有；加以僧侶階級和律師階級，當時也有很大的統治權能，亦可佔公地為私地。此等狀態形成以後，土地私有的制的趨勢，就流佈到現在。土地私有，係違反正義的。土地上的建築物，係人為的，屬於私人所有，雖屬正當；但土地係自然產物，非人力所能增減，屬於私人所有，是不正當的。因為世人使用土地的不等權利，與世人有呼吸空氣的不等權利相同。如果此等

權利被人否認，則必是被人所掠奪了。且在私有土地制下，可能發生下列幾種弊害：

第一、地主往往將土地置而不用，同時也不許他人使用或改良其土地，想做到地盡其利，是萬萬辦不到的。

第二、地主已有絕對的土地支配權，可以造成人身所有權，即無異擁有勞動者的生死權。因為勞動者靠出賣勞力與地主為生存，社會的財富儘管繁榮，地主的土地收入儘管增加，而勞動的工資却相反的下墜，使生活陷於困境。如此，則無論在任何文明國中，勞動者徒有自由之名，而處其奴隸生活之實。且在舊有的奴隸制度下，因為有主從的關係，為主人者，為自己利益着想，對於奴隸的飲食健康，還有所注意；若在今日無形的奴隸制度下，因為只有契約關係，勞動的生活狀況，屋主是不管的。所以物質的進步，好比是下白，而土地之私有，則好比上白，勞動者則置身於此上下白的中間，成為粉飾是很可憐的。

第三、在土地私有下，有金錢的人，都願意購置土地，因為想到這是最安全的儲款方法，自然要促使地價高漲。而投機家，看見地價日高，競相好買賣，於是就作土地投機，購置土地而不用，待價而沽，刺激地價更漲，地租更高。在這種土地投機不斷進行下，可以引起循環的工業恐慌。因為土地投機的结果，地價和地租都會逐步高漲，甚至高漲到變資本和勞動所得的部份，即利息和工資都下降。到了這個時候，必引起一部份生產停滯，逐漸波及全體生產各部門，而使各地方都發生生產上或交易上的局部停滯。這種情形，須到（一）投機終止，或（二）勞動效率大增，或（三）資本家和勞動家都願意得最低的報酬，或者三者聯合造成一個均衡的局面，然後才能恢復常態。但以後投機之風再熾，地價和地租又高，生產再受停滯，而循環的工業恐慌又起。

第四、最被破壞最繁榮的城市，愈多貧窮階級和犯罪之人。紐約的土地，貴逾舊金山，而紐約的貧窮情形甚於舊金山；倫敦的土地，貴逾紐約，而倫敦的貧困與窮愁也更甚於紐約。馬爾薩斯論於人口受食料限制的學說，是與事實不符的。喬治指出其中根本原因，係由於土地變為個人的財產。因為勞動者賴使用土地而生存，故地主佔土地的大部份，保護勞動收入

七的所得，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各走極端。所以土地所有權的不平等，即是財富分配不等的最大原因。土地所有權，實為決定一國國民之社會政治以及知識進境狀況的基本條件。

(乙) 地租發生的原因

土地未被他人使用以前，就有所謂潛伏的地租；但其發生，須待至土地所有權歸地主以來的時候。故地租係一種獨佔的價值。關於地租公律，李斯圖的學說，是大家都公認的，即以同一的資本與勞力，經常肥潤程度不同的土地，其肥沃土地的產品，必為超過窮瘠土地的產品，經超過的部份，就是決定地租的公律。在整個社會中所生產的財富，被所謂地租分割為上下兩部：這個地租總的確定，係由耕種界限（亦稱邊際耕作），或由資本與勞動在不付租價之天然機會上所獲得的報酬。在該線以下的生產所得，要付工資和利息；在該線以上的生產所得，則全歸地主。所以在地價低的地方，財富的生產或少，但工資和利息却高，這可見於新開闢的地方。在地價高的地方，財富的生產或大，但工資和利息却低，這可見於舊文明國家。又在生產力增高的地方，如果土地價值有比例的增加，工資和利息一如往昔，因其增加的部份，都歸地租獨吞；如果土地價值比生產力增加更大，則地租所占容許更大。

地租增加的原因，本身的係由於耕種界限的下落，已如上述。此外，尚有人為的三種原因：（甲）凡人口衆多的地方，就是繁榮的地方，也就是地租和地價較高的地方；否則，如果該地人口減少，一切社會上的便利因附減低，則地租和地價均趨低降。所以世界上地價和地租最高的地方，並非土質特別肥沃的地方，而是人口增加所給予其地以優越的地方。（乙）生產技術上的改良或發明，可使勞力節省，財富增加，於是土地的需要更大，即在耕種界限的土地，也被利用起來，地租因而提高，地價因而增漲。因此之故，每一技術的發明或改良，無論其為機械，或灌溉，使用蒸氣的器具，或改良治蠶的方法，都有節省勞力的功用，便都有增加地租和地價的趨勢。（丙）在進步的國家，一般人極渴望土地的將來價值，一定比現在高昂，於是就在邊際實業，似乎費盡腦子尋求，地價和地租都跟着高漲起來。（丁）以治道及其他方面有所改良，間接有助於生產力的增加，使財富之數量

甲、以波地租的方式，使土地無形中化為公有；
乙、以賦稅的方法，徵收地租，即用之支付政府的費用；
丙、除徵收地租外，廢除一切賦稅。（因為地租收入，足以支付政府全部費用。）

因為地租已經租稅的方式，收為國有，無論其土地屬於何人，也無論其面積大小，實際上已變為公產了。於是土地被機必受政命的打擊，土地獨佔必無利可圖，將有許多肥沃土地或地位優良土地，被迫出賣，沒有再種地而不用，也沒有墾地而不加改良的。由是，凡以工資為生的勞動者，勞心人也好，勞力人也好，都可以自由利用土地，工資因而提高。財富分配不均的救濟大因，已根本消滅，地復能盡其利，此後財富的分配，定能日趨于平均。且因廢除一切賦稅的關係，各種工業不再受賦稅的束縛，必能活潑發展，自由擴充，生產得以加增，利息可以提高，社會全體的財富，亦因以增進了。工資和利息相繼提高，財富的分配可得平均，貧困的恐怖自歸消滅；此後科學的發明，技術的進步，以及知識的普及，將使全體人民都得福利。「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於是忠實廉正的公德，蔚為風尚，必能造成一種理想的社會，那是毫無疑義的。

五、結語

國父訓示我們：「原夫土地公有，實為精研不磨之論。人類發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類消滅以後，土地必長此存留。可見土地實為社會所有，人於其間，又焉得而私之耶？或謂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資本購來，臨試即其第一佔有土地之人，又何自謂與？」準此而論，若人自損無服治享利思歸於大。但是階級之於土地問題的解決，祇主張單一稅的方法，其於所得無多，照價收買兩端，漠不重視，殊嫌失之偏狹。並且，階級忽視資本所得對於社會分配不均的流弊影響，而不求對策，也未始較遠旅行之也。

喬治曾說過：「在現在社會組織中，財富的分配極不公平，貧富懸殊太甚。富者顯奢淫逸，享盡人間快樂，貧者則衣食無濟，墮入人間痛苦」。階級對於社會的制約，可說已由上層階級下層；但其甚此原因，却不是如喬治所說，完全由于土地所有權的不平均分配。當喬治討論分配公律時，曾承認土地勞動資本，為經濟學上的三個要素；此三個要素的報酬，即係社會財

富的分配主體；即歸地主的日地租，對勞動的日工資，與資本的日利息。地主享有地租的結果，上面已經詳述，可不再贅；現在我們來談談資本享有利息的影響。國父告訴我們：「大概社會變化和資本發達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然後由地主到商人，再由商人才到資本家」。現在資本家有了機器，靠工人來生產，掠奪工人的血汗錢，生出貧富極相懸殊的兩大階級」（民生主義第二講）。彼格爾 C. P. Page 在其所著社會經濟一書中，也說得很明白，始曰：「合資公司，或是大資本家和農進家，併吞了小生產者，漸漸極不公平和極殘酷的競爭，以消滅小生產者，這是人人都知道的。除資本家和地主外，祇有逐漸的墮入無產階級的隊伍裏去」。又說：「小規模生產者的消滅，小生產者就要成大大公司裏的一個股東，根據他們所拿去的資本，和所做的工作，得到一點利益的分配。不然的話，他們會變成賣勞力者，天天到工廠裏去，隨為奴隸階級的一份子，常常是貧困而失望。所有的太生產事業，全為農產的貴族所獨有」。由 國父訓示和彼格爾的話說，我們得到一個概念，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除地主壟斷土地而操縱勞動家的工資外，資本家也能憑藉生產和資本的集中而掌握勞動者的生命，喬治所指「貧富懸殊太甚」的苦難不問現象，地主固要負責，資本家亦不能不負責。換句話說，即是社會的財富，勞動家會盡極大的生產責任，但所得的祇微薄而僅堪維持最低生活的工資，因此財富的大部份，都歸地主和資本家所有了。照喬治單一地價稅的辦法，地主可歸于消滅，但資本家却依然存在。社會上少了一種和資本家競爭獨佔財富的人，對資本家是很有利的，但於貧苦的勞動者，實在不會得到什麼好處。而且一切賦稅都廢除了的結果，工商業者自由發展的機會更大，在無地主和他們競爭的條件下放任的更放任，自由的更自由。沙里格曼教授 E. A. Scharf 的批評說得對：「美國許多百萬富翁完全為機會或幸運所造成，此種機會或幸運之來，不由於他一切的勤勞或任何人的努力，而是機會的偶然。土地投機，不過為各種投機總數的一部分，而所謂不勞而獲的土地價值，也不過佔此項資金的一部分。假若承認幸運的總機會應享他們所積蓄的財富，為何原故而否認地主享他土地增加價值或至價值的一部分呢？……我們一方面對於投機十萬元於土地，於次年獲得利潤百分之五十的地主課稅，而他方面對於投資十萬元於白糖托辣斯，亦給

之五十的資本主義，不知道這是依據何種正義學說？何以投於土地所得的利潤，而投於公司證券的所得便免稅？我們絕不能使人相信所謂不勞而獲的增價，只限於土地，事實上，土地上不勞而獲的價值，只為各種增價中的一件實例。

喬治討論分配公律時，他已知地租為社會造成，也承認利息是出自自然，但他對地租歸地主則認為不對，而對於利息歸於資本則認為正當。所以喬治認為資本為勞動的一種形態，不是與勞動對立，而是隸屬於勞動，勞動勞動之下，有熟練勞動和不熟練勞動之分相同。他說：「資本與勞動兩者，不過為人類努力活動之同一物而具有不同的形式。資本為勞動所造成，而所謂儲蓄在物質上的勞動，恰如太陽之熱，儲蓄於煤炭中，待至煤炭入了火爐，然後散放於外，同一道理。所以生產上使用資本，究其實，不外使用一種勞動。故資本與勞動在人類努力活動上，對於相等的活動，必有與同等額的報酬」。所以喬治對經濟學上的三個生產要素，認為實際並無三個，只有兩個，即勞動與資本。因為喬治持着這個理論，故祇看見地租造成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沒有看見資本造成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祇主張地租課稅，而不主張資本課稅了。假定現在有個社會，沒有金錢，更無所謂貨幣，還是古代的物交換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裏面，一切財富的生產，只靠土地和勞動兩種，那麼喬治為社會大多數謀幸福的目的，相信必能如願以償。或者純粹在解救貧農的立場，志在消滅地主，為使有志有力耕種的窮農，都能獲得土地的使用，不必存着達到財富平分而消滅貧困的希望，那麼喬治學說，也將更為名貴，無懈可擊。無奈後者全屬奢望，而前者則難再覓物交換的社會，誠如蕭伯納所說：「單一稅論者，在原則上是不錯的，但是時代却是太遲」。所以就成了美中不足了。

然而，當時正是地主勢力蓬勃時期，喬治居然提出沒收地主之土地的主張，雖然遭受許多有力的攻擊，完全視若罔聞，不能不佩服他勇氣百倍。而土地私有，是始終要解決的，在土地問題沒有真正得到解決以前，喬治單一地價稅的學說，始終要在學術界，尤其是，土地問題的學說界，佔着最顯高的地位，那是毫無疑義的。

研究學術的取材問題

蕭文哲

讀中國之命運札記之一

總說，「國恥」之由招致，又必追溯於滿清一代政治的腐敗，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落。（見中國之命運第二章第一節）又說：「我國學者務使學術切於人生的日用，文化歸本於建國的基業」（見同書第六章第二節）。要說學術衰落，達到「國恥」上遠則期望，須於研究學術的取材，特加審察。

滿清以來，我國學術不切於人生的日用，更未歸本於建國的基業，其所以致此者，除因政府以八股經書取士外，即由於學術研究的取材不當。自唐宋以來，「古文尚書考異」及「國朝文獻通考」等書，以至於「古史辨」；從陳第的「毛詩古音考」及顧炎武的「詩本音」與「音學五書」，以至於章炳麟的「文始」，其間如錢大昕，戴震，崔述，王念孫，王引之，嚴可均等，雖亦用科學方法，研究經籍，可謂「研究學術」，僅取材於故紙堆裏的「不當者」一。

民國以來，學者對於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世界各國所有的主義，雖能熱心研究，不無成就，然亦限於主義，政治的文字學術，是以考驗結果，迄於民生國計，無何補益，且謂「此研究學術，僅取材於故紙堆裏之不當者」。

試看歐美各國之富強，由於產業發達，民強國利。究其所以致此者，由於學者研究學術的取材恰當。自英人瓦特發明蒸汽機後，輪船火車與紡織機等，跟着發明，促進產業發達。自德人伽利略發明望遠鏡，引起顯微鏡的發明；法人李納克發明攝影器，促進醫學發達，增進人民健康；自法人羅邦發明特種司令機後，由於看見輪船上蒸汽機發動靈敏所致，促成競爭進步。明時發明印刷機，由於看見鐵匠鑄造鐵片既速而又近又大所致；李納克發明攝影器，由於看見一童伏耳在他地細聽，格外聽得清楚所致；羅邦發明特種司令機，由於看見砲彈的製造與使用所致。自自然界發見種種奇事，百草發明奇藥，有見鳥棲發見明室，皆以自然界實物及現象為研究的材料。

根據以上所述，當知我國學術的衰落，實由於取材的期望，使學術切於人生的日用，文化歸本於建國的基業，唯有與研究學術的取材，不宜限於故紙堆裏及陳腐文字，而應注意於自然界實物及現象的考察，在書中不見購

試論設計工作

薩師炯

行政三聯制研究之一

行政三聯制在行政學上的地位，正如五權憲法在憲法學上之地位亦然，它是一種適合中西政治理論與實際經驗之新政治原理，或者說是一種新政治構想；任何一種新原理或新構想的運用，因為沒有成例可援的關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行政三聯制亦復如此。我們應該研究行政三聯制在政治理論或政治史上之價值，同樣地，我們也應該研究行政三聯制中每一部份之實際的運用方式或在運用過程中的若干問題，以求達到它在中國建國大業中應負有之偉大的使命。

在這種文章中，我打算先討論一下行政三聯制中之設計工作。

由整個行政三聯制說來，設計工作只是其中的一環，但是由實際的運用說來，設計工作幾乎可以說是一種基本工作。沒有良好的設計，執行即為收支，而收支即為預算，換言之，設計有似財政上的預算，執行即為收支，而收支即為預算，沒有預算，自然談不到收支，而其收支狀況，雖則未必即為一筆糊塗帳，至少也是零亂蓋章，明乎此，我們可以知道設計是一個如何重要的事情，同時也是一件如何艱鉅的工作；一個不合理的預算，收支既不能以之為據，決算亦不能以之為憑，設計對於執行考核之關係，亦復如此。現在我想提出設計工作中的幾個問題，并且說明我個人的意見；當然的，我絕不敢自認為高明之見，但是倒很希望引起國人的討論，藉使我們的设计工作，能有更多的效果。

設計工作
（一）

第一，設計的計劃，必須與整個國策相配合。一般說來，作為國家政策的指針者，通常都只是比較抽象的原則或證明，而設計的計劃，則為實施國家政策的具體辦法，這些辦法之應該與指導政策的原則相配合，簡直是天經地義。今日指導我國國家大政方針者為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之抗戰建國綱領，抗戰建國綱領則又根據全部黨義而來，因此，今日所設計的任何計劃，直接要與抗戰建國綱領，間接要與全部黨義相配合，甚至於我們可以說任何計劃都應該是抗戰建國綱領或全部黨義的延長或引伸。欲求達到這一點，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例如抗戰建國綱領第二十七條規定：「開發礦產，樹立重工業的基礎，鼓勵輕工業的經營，再發展各地之手工業。」要想依據這條綱領，來擬定計劃，就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欲開發礦產，我們必須知道中國究竟有什麼礦產？在什麼地方，數量若干？最需要的是哪些工具？開發時又有什麼困難？鼓勵輕工業，究竟着重在那幾種？鼓勵的限度又若何？這就要了解今日全國輕工業的實際狀況，全國人民的需要，乃至一切與輕工業有關的問題，鼓勵經營紗廠，就必須知道全國究竟有若干棉田，其產量又若何？發展各地之手工業，當然是指就各地所已有者而言，這樣，不特對於各地手工業的情形，應該有澈底的認識，而且對於它的可能發展之前途，又要有科學的估計。然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似乎都是「談何容易」的事情，又如綱領第二十三條規定：「整理交通系統，舉辦水陸空聯運增築鐵路公路，加開航線。」它的實施就和上述工業的開發，有密切的關係，并且即就這一條的本身而言，也不僅是技術問題，鐵路的修築，固然要請教工程師者，但在一條路線決定以前，它不僅是技術問題，而且要和國家其他部份的行政相配合；這樣，在事實上已經超出技術的範圍，實為極明顯的道理，因此，如何依據國策來擬定計劃，這是一個極端繁複困難的問題。

第二，計劃必須有預算，這是絕對的真理，但是草擬計劃，已不是一件容易事，草擬計劃而再加上一個預算還是難上加難，特別是在戰爭時期。首先，我們究竟其輸入為出呢？或者還是量出為入呢？換句話說，究竟是計劃預算呢？或者還是預算設計計劃呢？量入為出，將限制建設工作的進展，量出為入，未必為今日財政現況之所許可，而且預算如果過度的膨脹，其可能引起的後果亦須作最大的考慮。是以如何在兩者之間，得到一個合理的價值，是一個大問題；其次，無論先計劃而後預算，或者先預算而後計劃，總算預算的另一困難，依然存在，即如何使預算準確地反映物價波動的影響，現在各種機關草擬預算的時候，通常均已考慮到將來可能的物價波動，但是又無從確切預知波動的情形，一個地域的情形已經無法預知，如其業務普及若干個地域，更是茫然，於是客氣的照今日某地的物價，加上百分之若干，不客氣的則加上若干倍，這種辦法自然是反科學的，於是在審核預算的時候，財務當局和草擬機關必然要有一番「筆墨官司」，而到將來執行的時候，百分之幾或倍數加得多的，如果當地物價并未波動或預算高於物價的波動，其結果是浪費；反之，預算低於物價的波動，於是只有出之追加預算或縮減工作，再或因預算與波有利於物價的關係，在執行期中，不啻由於何種困難，凡是工作情況不能依原定進度進行者，一律歸咎於物價，藉以避考核時的追究。當然，也有的機關老實的依據「此時此地」的情形，來編擬預算，以致真正影響到本來的進行，但是不管怎樣，預算的草擬之成爲一個問題，則是確切的事實。

第三，設計的計劃，除了預算之外，必須力求人地事物之配合，這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舉例以言，建築一條鐵路，究竟需要多少員工（人），這些員工是什麼程度的，有沒有把握，這些問題，一方面是交通主管機關應該負責的，但是却要和教育主管機關聯繫，甚至於要和教育部門的計劃相配合。記得中央設計局在其所編擬的戰時三年建設計劃大綱整理辦法中，（三十二年之年度計劃）大致亦依此設計，曾經定有「配合計算表」，在此項計算表之中，有預定數字，配合數字與決定數字等項，預定數字即指其計劃之必備條件和人材地物等在質與量兩方面所預估之數字，配合數字則指此類條件中「已有」及「可得」之數字，決定數字則指經過配合計算後所決定之數字，並且定有各有關機關配合的程序，還在原則上自然是合理的。但是這個辦法的執行，也有它的困難，主要的問題是預定數字之擬定，已非易事，而在沒有設計考察經驗的我們，對於配合數字之擬定，簡直是難上加難，然而這些數字與他日計劃之執行，密切相關，絕對不能敷衍塞責。明年度計劃的起草，聞已將這些表格取消，以避免再有「行不通」的情形。

(四)

最後一個問題，是計劃的進度問題，有了計劃，自然必須有預定的進度，這個預定進度，一方面是計劃的本身，同時也是將來考核的根據。然而這個預進度的擬定，也不容易，首先在進度的估計上，草擬計劃的人，多半未必就是將來執行的人，但是却又多是主管的人，在草擬的時候，或者爲了「好看」；或者爲了急切；或者爲了希望早日領款；或者爲了對於實際工作的進展可能之認識不夠；也或者爲了過於熱心，於是唯恐進度的太慢太少，到了期間，實際情形與進度不符，於是只好將進度的遲緩，向天時，地利，……等不能控制的理由上一推，這樣，便原有的進度完全失其意義。其次，進度的本身，也不易擬定，但是這個百分率的擬定，並不是容易事，舉例而言，建築一條長一百公里的鐵路，如果預定進度一年完工，最初三個月完成百分之二十五，這個百分之二十五，按常態來說，是將完成二十五公里，但是事實上未必必這樣，也許最初三個月是將運送全路所需之材料，以及土石方運河等工程之類，而全路的鋪設，要等到最後三個月，全路同時鋪軌，也未嘗不可，如果要將全路各段工程的總和，來計算一個百分率，那麼各種事業範圍種類極多，百分率的計算就不是朝夕之事。這樣，百分率的訂定十分困難，特別是將來如果要拿來作爲考核根據的時候。

(五)

綜上所說，可知設計工作之不易，我們由於三十二年度計劃的起草，並來擬定三十一年度原定的配合計算表之類，即可了解。然而這是說明設計工

之沒有前途嗎？

不，這些問題不惟不是表示設計工作之沒有前途，反之，由於困難，正顯其重要性，設計本來就是科學時代的產物，中國的科學，沒有充分發達，對於這個科學方法自然困難百出，僅僅就統計數字一端而言，就充分暴露設計工作的不易，然則我們是否必要等待將來呢？

是亦不然。需要產生科學，科學的本身也是由經驗而來，決不是飛騰草率而得，因此，我們現在必須不斷的在設計中，探求科學的設計：

第一，中央設計局對於設計工作之進行，除了依備有材料以外，應極力推動調查工作，以求備今後之設計，能有更確切之依據。此種調查工作，應該包括全國之天時地利與人和，所包括的範圍既如此之廣，當然非一朝一夕所可期功，而且亦未必為今日之人力財力所能從事，但是這種工作，嚴格說來，實為科學設計所不可缺少的基礎。是以中央設計局似乎可以就目前所最迫切的部份，先事進行，同時可以和中央研究院，國內各大學，研究機關以及主計處等機關協力合作，沒有開始，就沒有成功，至於目前設計，則自然只好先以已有的材料或估計為準。而在實施之中，隨時糾正可能的錯誤。

第二，過去的設計，在事實上是由中央第二級機關（如行政院各部會）擬辦，中央設計局不過加以綜合彙編而已，由我們看來，這種辦法，各部會所負的責任太大，說句老實話：國家的整個政策，決不是各部會所能決定的，至於各種事業的執行情況，也只有各種事業機關或附屬機關最為瞭解，而且即使各部會既瞭解其情況，又難決定大計，但是其所知道的或決定的，至多也只限於它本身職掌範圍以內而已。司經濟者，以為經濟事業最重要，司交通者，以為交通建設第一，司財政者，以為財政緊縮為當前首要，……由其本身說來，即使都沒有錯誤，由全國各部門說來，則不能不有輕重緩急之分，何況即在經濟或交通之內，究竟以開發那種經濟事業建築那條鐵路，還都不是技術問題，而且彼此之間，還需要密切的聯繫與配合。因此，我認為今後的设计，應該由中央設計局開其端，先擬定計劃的大綱，（當然的，這個大綱不能僅為幾個原則，而且在其擬定過程中，也可以先由各行政機關參加意見），然後交由各行政機關作技術的設計，例如建築鐵路

應由中央設計局決定，交通部只負擔測，估計之類的工作，必須如此，而後設計才能有全國性。必須如此，才能達到與國策配合與夫人時地事物互相配合的目的。

第三，現在的设计，由於「材料」的缺乏，所以在原則上說，只能作為試驗性質，因此設計者的設計工作，必須與負責核及執行工作者，全面合作，執行者在努力執行之餘，如果有所不能，不必諱疾忌醫，考核者必須了解考核的目的，并非吹毛求疵，而是希望研討執行的困難所在，設計者亦須出之以虛心的研究的態度，由執行的失敗，追尋設計的缺點，而後方能達到設計的成功，換言之，我們必須確切了解設計執行考核并非「三種分立」，而是整個行政體系的運用。

第四，在通常情形之下，國家財政採量出為入的原則，因此，先有計劃而後再有預算，是合理的，但是量出為入究竟有其限度，何況我國在此軍事時期，因此如何斟酌國家財力，擬定計劃，然後再依計劃擬定預算，是一個極難的問題，而有待於設計當局與財政當局之妥慎的合理的觀察。由我看來，如前所述，設計由中央設計局訂其大綱，再由各行政機關作技術上的設計，當其技術的設計送由中央設計局彙編時，即可依據國家需要與財政狀況，對於計劃合理的調整。問題困難的，在於計劃之執行常受物價波動的影響，過去各機關大都對於預算方面，擅自「加減」，這個辦法之不合理，實已言之，今後的辦法，除了控制物價之外，最重要的是各地物價之精密而合理的調查統計，各機關今後所送之預算，可以變更方式，即除了說明所需款項之外，應該註明所需「實物」或「人工」之費與實，審核預算者，一方面依據技術以審核所需「實物」及「人工」之費與實，審核預算者，一方面其所擬經費，這樣，將來任何追加預算之請求，均可以其實據物價以審核為準。在審核方面既有所依據之苦，而執行者亦可放心工作，而且此種物價，必須以事業之當地物價為準，此種方式，或可解除當事人之困難，甚並將使今日之預算數字減少。

第五，今後對於進度之擬訂，一方面仍仍酌減百分率制，以資醒目，同時對於進度，應有詳盡的說明，不能出之以籠統的方式，擬定每三個月完成百分之二十五，則此百分之二十五究竟代表些什麼內容，另行按期說明，同時再予以總說明，即便在進度表上無涉列表，至少應當作為附件，以備參考，并且應使他日之總責任。以「以上」皆為一般設計工作中之重要問題，略抒所見，當然的，在各種各類的計劃乃至上述每一問題之中，都相當複雜，他日有暇，容當另文補充。

(完)

縣各級組織關係圖的研究

張遠謀

縣各級組織關係圖，係指同縣各級組織綱要於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由政府公布的。該綱要係屬關係圖，是縣各級組織綱要的附件，其重要作用，在表明縣各級組織綱要的方面關係，以及衡量的方面的聯繫。故命名曰「關係圖」。在過去，立法界一貫的慣例係文用語，務求簡單扼要，因之其所欲表明之意義，反而有時不免晦澀，有待執行者和學術界加以釋說，至於在條文之外，另附圖表，表明條文中的含義，則絕無僅有。清遠是新縣制的創作呢。

縣各級組織關係圖的重要作用，既然是在顯示縣以下各級組織的體系，及其價值的聯繫，所以，圖的繪製必須與縣各級組織綱要的內容規定，完全配合。本此要點，作者認為關係圖中尚不可以商榷之處，茲分述之：

第一、我們首先應當說明的，總裁在中央訓練團講述確定縣以下地方組織問題時所發表的縣各級組織關係圖，與國民政府公布的縣各級組織關係圖，兩者內容未盡符合。前者於縣政府及鄉（鎮）公所以下，附有農會，工會，商會教育會及其他民衆團體，而後者則否。依照 總裁訓示：以職業為劃分標準的民衆團體，與發展國民經濟建設，動有密切關係，且為地方輔助組織，就地方全部標準而言，猶如一架整架之機器，民衆團體當有「零星附件」的作用，不可或缺（見總裁講定縣以下地方組織問題及縣以下黨政機構綱要第四條）。而且，縣參議會之議員，職業團體代表，可佔總額的十分之三（綱要第十五條）。所以職業團體組織的健全與否，有關於新縣制的推行，立法者應予注意，其應令人察照。

第二、新縣制將縣及鄉鎮兩級制，縣之面積過大，或有特殊情形者，因制宜，始得分區設置（綱要第四條）。雖然依照 總裁的訓示：「縣之鄉鎮數在十個以上者，以設置區署為原則」（見講定縣以下地方組織問題講詞）但究非各縣均須設置區署，這和二十四年一月南昌行營訂頒的勸導省份各縣分區設置辦法大綱，以及二十六年六月行政院訂頒的各縣分區設置暫行規程，准許各縣普遍設置區署者，其立法意旨即有不同。況且，新縣制下區署的性質為縣政府的輔助機關，而其作用，亦僅在代為縣政府管轄各鄉鎮辦理

各項行政及自治事務（綱要第二十五條第一項）。關係圖中將區署的位置，繪製在縣與鄉（鎮）的中間，並用直線聯繫之，殊易使人誤會，認為是縣以下的一級了。作者的意思，區署在圖中的地位，應表示如下圖：



查二十七年四月，總裁在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改進黨務與調整黨政關係」時，附有「縣以下黨政機構關係草圖」，該圖中係將區署列在縣政府與鄉鎮公所的中間，關係圖是由上述草圖脫胎而來，故仍如舊貫，未經更動。但是我們應該 總裁對於草圖的「圖例釋要」，他說：「從前縣政府以下，即空制無物，政府與民衆之間，根本脫節，無從聯繫，因之幾有分區設置」制度的產生。……本圖的區署，首先按着現行行政系統，充實他的條件，改設五個指導員，……指導指導鄉鎮事業，就等於每個鄉村都設置五個指導員一級。……同時設立區參議會，使有才能的民衆共同參加區政設施」。一面又說：「本案案之主要精神，即在將縣以下各級，相向的形成虛實互用的關係，例如縣的一級為實設，其下區的一級為虛設，區以下鄉鎮一級為實設」。我們細釋其前後文義，是徵在草圖上的一級為虛設，區以下鄉鎮一級為實設。我們規定，既以不設區署為原則，必要時始得設立，則關係圖上所列區署的地位，自然有加以明動的必要了。

第三、依年齡及性別而區分的民衆綜合組織足以加強民衆團結力量，協助推行地方自治工作。所以，綱要中雖訂有鄉丁隊（現改稱國民兵隊）的組織，而關係圖中則將在鄉軍人會，長老會，婦女會，少年團，與壯丁隊並列，一方面藉以表明此種民衆組織在新縣制下作用的重要他方面也是表明地方自治人員應該協助組織運用的責任。但是，我們期望此種民衆組織發生力量，在橫的方面，固應與縣政府及鄉鎮公所密切聯繫；而在縱的方面，尤應注重自上而下逐級健全，俾能靈活運用，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關係圖中表明的各級民衆組織，在縱的方面，未曾用聯絡線以表示其上下級的統系，一似各級民衆組織，祇許有橫的聯繫，沒有縱的統系作用，似屬未慮妥適。

公務員異動之原因及其補救之辦法

李宗義

近來公務機關人員異動太多，影響行政效率至鉅。茲就管見所及，將公務人員異動之原因，及補救之辦法，分述於後。

公務機關人員之異動，其原因致為複雜。但舉其最顯著者，可分為自動原因與被動原因兩種。而自動原因，可分左列四項說明之：

一、為增加生活待遇而異動。抗戰以來，物價高漲，多數公務員，入不敷出，感受生活之壓迫，而不能安心服務。故棄公務而經營商業者，時有所聞。即免強保持現狀者，為求增加生活待遇，時有異動之念。而況各機關薪津多不劃一，金融機關，往往較國營事業機關為優；而國營事業機關，又往往較普通行政機關為優。待遇參差不齊，津貼多寡不等，故公務人員，為求增加待遇，多得津貼，常從甲機關轉入乙機關。從乙機關又轉進丙機關。人事更動頻繁，減低行政效率。最近依年齡大小發給米貼，又引起不少異動。

二、為提高職位而異動。一般公務員，因求進心的關係，對於原任職務，往往不願久居，常生異動之念，加之各機關之考績制度，有名無實。賢能者，未必獲進，年資較深者，未必擢升。故一般公務員，為提高自己職位，常多見異思遷，遇有較高職位，往往不擇手段，到處攪爭，以求獲得優越之位置。此種伴隨風氣，已成普遍現象，雖責明該機關長官，亦無法制止也。

三、為選擇工作而異動。各公務機關，對於職位分類，未嘗舉辦。主管長官任用人員時，不為因人設事，而不能為事擇人。人與事不能配合，才與職不能相稱，以致工作人員多感非所用，用非其長。工作效率，固無法增進；而工作人員，亦多鬱鬱不樂，不能發揮其能力。故一般公務員，為選擇適當工作俾能展其所長，亦常有異動之現象。

四、為改換人事環境而異動。各公務機關之人員，常因關係不同，地域不同，與來歷不同，不免此疏彼界，發生人事摩擦。感情既不能融洽，工作

即不能合作，人事環境，發生阻礙時，一切業務，將無法開展。一般公務人員，為改換人事環境，避免精神痛苦與工作艱耐起見，亦常多變更職務。

上列四項，為公務員異動之主動原因，請再分述其被動原因。

一、增加新機構，近數年來，為適應抗戰經濟之需要，中央與地方，所增之新機構，為數甚多，而每一機構，類多組織龐大，需才甚衆。各機關主持人員，為求迅速開展業務起見，往往不擇手段，選向各機關，網羅熟練員工，或以名位誘之，或以情感動之，或以關係縛之，竟使當事人，無法拒絕。雖欲保留其原職，而不可得。此種異動行為，是屬於被動性質的。

二、裁併舊機關，無論中央與地方，有時為變更業務，裁併機關，為事實上所難免。原機關之公務人員，多被迫離職，而無所依歸，現行之人事制度，尚未完善，對於離職之公務人員，如何轉移與安置，均無具體辦法。被裁人員，為自謀生活起見，因而亦不得不向各處異動。

三、機關長官更替，我國人事制度，尚未建立，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區分，尚未明白規定，各主管人員，對於位階，濫引濫用，仍為事實所難免。一般公務人員，常隨長官去留而進退。新舊交替，人事更張，長官時有更換，而人事常起紛擾。俗語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影響人員異動至深且鉅。公務機關人員異動之主要原因，既如上述，茲不備備，提出治本及治標辦法，以供研究。

治本的辦法分左列二項：

一、建立人事制度，穩定政治，加強行政效率，其基本條件，在建立人事制度，政務官與事務官，必須嚴格劃分。政務官負政治責任，其主要任務，在決定政策，並領導所屬，推行其已定之政教。事務官負行政責任，其主要任務，在執行政策，推行業務。政務官因負政治責任，儘可隨時異動，不影響整個行政之進行。而事務官為終身職務，絕不可隨政務官而進退。此

禮人專制度確立以後，一切人事異動，將無形消滅。政務官之調動，庶不至引起行政之紊亂，與人事之糾紛。關於公務員之訓練任免，調用，考績，晉升，退休及撫恤諸端，均須有詳細規定，務使公務員職位有保障，專業有前途。公務員既有保障，必能安心服務，公務員自能安於其位，非特提高行政效能，亦必能穩定政治。而公務員異動之現象，可不再復現矣。

二、調養公務員薪給，自抗戰軍興以來，物價飛漲，生活增進，薪給數百倍。而公務員之薪給，遠不及物價漲額之速，此種情形，固不合理。公務員之生活，不能維持，何能寫其安心服務，提高行政效能。即以精神力量，竟則物質困難，亦必有其限度。母氏從公，為君子所難能。故調整公務員之薪給，實為當今之急務，亦為解決公務員異動之根本方法。關於調整薪給之辦法，分三種步驟，次第實施，以達到合理之解決。

甲、各機關之薪津須力求劃一以示平等，戰時政府各機關，為補助公務員生活起見，特規定戰時生活補助費，及米貼辦法，對公務員之生活，不無小補。但即令機關之津貼，往往優厚，而辦事機關，而辦事機關，又往往優厚於普通行政機關。津貼名目不同，數額多寡互異，此種不平等現象，實為促成公務員異動之主因。治本之法，須先劃一各機關之津貼，務使各安本位，不生異動之念。九中全會決議案中，關於改進人事制度一節，曾明白指示：凡國家銀行及國營事業機關之人員，不得巧立名目，特予優厚，以示平等。各機關津貼中央意旨，妥定辦法。劃一律貼。凡政府所屬各機關，其津貼名目，力求一致，以免發生異動之現象。

乙、公務員之薪給應與工商界工資保持平衡。戰前公務員之薪給，較工商界工資稍優，未免太高。（瓦本工每月工資約十五元至二十五元，擔任官雜月薪給五百元至六百元），戰時公務員之薪給，仍保持原狀，而瓦本工資，已從每月十五元增至七百元，兩者相較，公務員之薪給，又失之太低。太高與太低，均非合理現象，亟待補救者也。

公務員薪給太低，則優秀人才，將競向工商界就業。行政效率之降低，其為害尚小，而一般公務員，為生活所迫精神苦悶，意志消沉。此種現象，其為害實大。戰時政府費用浩大，雖不能按生活指數，調整薪給。但最低限度，亦須求得公務員之薪給與工商界員工之薪資，保持平衡狀態。

丙、公務員之薪給應按生活指數而增減，現代公務員之薪給，非昔日君王對臣僕之賞賜，而是政府對工作人員之報酬。薪給數目之增減，不但須與各地方物價，作彈性的規定。尤須適應社會經濟之變遷。與生活指數之昇降，作合理的調整。現我國各級政府官員之待遇，仍照民國二十二年國民政府公布之暫行文官官俸表之規定，實距理想甚遠。現雖有戰時生活補助費，眷屬米貼及五成津貼辦法但為數太少，無補實際。人心浮動之現象，並未消除，故為徹底解決公務員生活問題，減少其異動事實，應取消一切津貼名目，按生活指數，對公務員之薪給，作合理之調整。

解決公務員之異動，其治本之法，首在人事制度之建立，與公務生活之改善。但制度之建立，非一蹴可成，生活之改善，亦不易立時實現。在治本方法，未能實施以前，有兩種應行方法，似乎可以先行實行：第一、供應公務員生活必需品並按人口定額分給，目前最感經濟壓迫，生活艱難者，厥為薪水階級。公務員與教育文化界人士，尤為顯著。若不設法予以補救，其影響政治與文化非想像可得。政府當今之急務，在統制物資，平抑物價，加強生產，實行節約，務使全國國民實行戰時生活。一德一心，同甘共苦，國民生活之水準，必須保持相當平衡，不能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造成社會經濟畸形之發展。關於生活必需品，如食糧、衣着、燃料等，統由國家辦理供應，按公務員確實人口，定量分給。此種辦法，果能切實施行。不但公務員之生活，可以勉強維持，減少異動之現象，且戰時之畸形經濟與奢靡生活，亦可藉以嚴加限制。第二、加強人事管理，各機關任用人員，除依登錄法，甄審任用外，並須由新任人員，填具「委任書」，該書內容，除列舉職務守則及規格外，並特註明：凡任職未滿一年者，不得請求辭職，更動職務。此項規條之增訂，可以加強約束能力，減少異動之事實，使各機關人員，不致見異思遷，常存五日京兆之念。

凡公務員離職時須由各該機關填發證明書，填明服務年限，及考績記錄，新任人員到職時，須先呈驗該項證書，凡在一機關任職不滿一年者，即何離職，不准錄用。此種證書之填發，直接可以考查工作之成績，間接可以限制人員之異動，此種治標辦法，實亦加強人事管理必需之步驟。

總之，人事制度不能建立，行政效率無法提高；公務員之生活，不加改善，人員之異動無法制止。公務員為國家行政幹部，統制建國之中堅份子，務使其能安心服務，效忠國家，樹立風尚，化民成俗，此非權託空言，可濟於事。必待實明當局，從治本治標兩方面，確立制度，決定辦法，厲行法治精神，調整社會經濟，以樹立建國之基礎。

論曹操之用兵

徐壽麟

李進山關兒時，有或論曹操胡成郭吃之句

：或東披亦曾小兒穉劣，為其家所厭苦，輒與數錢，令其聽說古語。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有涕涕者，聞曹操敗則喜。蓋三國戰爭，久已有人稱為通情之故事，流傳民間，且謂此類故事者，大抵祖劉孫曹，故自唐宋以來，社會上對於曹操無好感，於曹操深表同情。明雖實忠作三國演義，即本此作風，以攻曹操，而今日流行之捉曹操打曹操等劇，更謂其可憐，不習餘地。加以一般文人，謂曹不篡漢，為庸承父業，以成其父志之志，故曹氏父子，於漢室若為亂臣，因而司馬光撰資治通鑑，朱子作通鑑綱目，皆不以正統與之，以致曹操在吾國人之心目中，為奸雄，為賊子，幾無一可取之處。然平心論，曹操實有傑出之才，於安定社會，亦有功過足以相稱之處，即謂為亂臣賊子，亦有異於其他亂臣他賊子之道。否則，決不足以號召其眾，以成其基業。

城今安徽懷遠縣西北七十五里。又據魏書：曹操餘五百餘人。後復收兵，屯河內（郡治在今河南武陟縣西），亦僅有兵千餘人，未能以河內為其根據地。直至袁紹委孫策為東郡（今河北大名以東及山東長清以西地）太守，治東武陽（故城在今山東聊城縣西四十里），始有其立足地；旋以魏州刺史劉岱為河內中郎將，其屬屬魏州刺史。據始有兗州。後漢帝州令陶質郡東平國任城國泰山郡濟北國西河內郡留以北諸地。而兗州。兗父泰山詳險與而外，大抵皆四戰之地。不如袁紹之有冀州，南臨黃河，西倚太行；不如公孫瓚之據有幽州，西倚常山，北接虜虜居庸；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復不如劉表之領荊州，劉璋之領益州，孫策之據江東，坐鎮一方，並以自雄。故曹操最知軍事，皆未克憑藉險阻，然操轉戰經年，每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卒能平定冀州，再據東海，以司隸所屬諸地，發令所及，西至關右，東據東海，北出虜境，南抵襄陽。蓋以善之戰也。當取攻時，雖居平原之地，仍足以勝人。關東再論山東形勢，謂「以自守則易弱以亡，以攻人則足以自強而乘事」，其論河南形勢，亦謂為國戰之地未可以守；曹操慎先有兗州，後有豫州，其能自強而集事者，要不在在戰略上常取攻勢之故也。

三民主義半月刊

當取攻勢者，雖不必多為懸守之慮；然亦須有其善其備之條件，其最要者，即為謀略與武備之門意志。古代戰爭，憑藉而舉之武備，故曹操之勝負，常視其兵之戰鬥意志如何，以為決定，而戰鬥意志之養成，在古代多賴立於其主將與其部隊之關係上；尤以倉卒起兵，一旦聚而不相識之人，以兵以為將，倘無特殊關係存在其間，每每有分崩離散之患。項梁居吳，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於下，及吳羽林兵，率江軍子弟八千人，皆以素所交與之士為其長帥；漢光武之起兵，亦以其兄伯升好俠愛士，召募甚多。大抵臨時起兵者，均有素所深交之人，為其羽翼。而曹操之部眾，其為族誼誠實鄉誼之因素者甚多，特別顯著，故其戰鬥意志，特別堅強，常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

先以其兵而言，一曰出自招募之兵，二曰借自州郡之兵，三曰降卒，四曰徵兵，五曰家兵。其時當魏平定天災流行之際，饑民與盜匪，遍地皆是，故募兵最易，然份子複雜，素質不佳，若不經嚴密之訓練，則其戰鬥力極弱；曹操初起兵於已吾，全用募兵，行至黎陽，一戰即敗，即為最初未能得力於募兵之明證。州郡之兵，訓練有素者，當戰時之兵為優，然其時州郡兵多缺乏訓練，無紀律，故關東討董卓兵，號稱數十萬，未建戰功，而僅以歸附百姓為事（註一）。曹操最初未據州郡，而僅以歸附州郡之兵，與之素無關係，更不可用，故行進龍亢，即叛變以去。是曹操起兵之初，又未嘗得力於州郡之兵。至若收用降卒，其最初為破黃巾於濟北，受降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者，以為青州兵；及與呂布戰於濮陽，青州兵臨陣即潰。曹操陣亂

二三

幾全軍覆沒。且曹州兵紀律極壞，沿途劫掠(註二)，故降卒未易運用，而曹操在首事之初，未嘗其利。若言徵兵，則曹操初未有根據地，無從運用此種制度。故曹操最初之基本軍力，僅為家兵。

家兵有二種：一為曹洪所領之家兵及曹仁所領之少年子弟，大抵均為家兵；一為附屬曹操之各地將領，亦每每各有其家兵與賓客，均非曹兵，前者可謂有直接關係之家兵，後者可謂有間接關係之家兵。以此等家兵為主，再配合召募而來之兵，與歸附之降卒，故曹操常能居於主動之地位，以攻其敵。尤以曹氏舉世仕漢(註三)，在曹操為以族，由其族人子弟及各家賓客僱傭所組成之家兵，有族誼及主從關係存在其間，常死而不去，最為精銳。例如曹操當龍亢其變之後，極為狼狽，洩曹洪將家兵千餘人，益以臨江上甲二千人，及丹陽募兵數千人，與曹操會於龍亢，曹操兵力始復振，其後曹仁所結台之少年千餘人，亦俱歸曹操；故曹操得有子弟共約三千人，為其基本軍力。其能擊破黃巾百萬於許北，且驅退劉備也海廣之兵，陶謙屯鄆平之兵，冀得屯臨沂之兵，所向克捷者，當為此類僱傭其戰鬥意志堅強之故。其與呂布相戰於濮陽，因曹州兵臨陣，以致大敗，且軍糧已罄，而部眾猶不敢散者，亦必為彼等結締相離之故。至若其後各地將領之歸附者，如任峻收家兵賓客數百人以歸曹操，李乾合賓客數千於初中歸曹操，呂度為曹操從事，以家兵守湖陸，故城在今山東魚臺縣東南六里(註四)，及曹操遣樂進護其本部募兵千餘人，皆可歸入曹操所領子弟兵之範圍，統謂之家兵。

其重要將領，又多為海濱宗族姻鄉，如夏侯惇及孫權淵曹洪曹仁權初即相隨攻戰，夏侯氏與曹氏在曠野其為姻鄉，有歸附之親，曹洪曹仁俱曹操從弟，且此數人皆有智謀，以勇勇善戰聞。尤以許褚相隨，其於曹操軍隊之組織，有極重要之關係。褚為曹兵，警衛雄毅，勇力絕倫。漢末會聚少年及宗族數千軍，聚於以禦寇。曹操初在淮汝之時，褚以衆歸曹操，曹操以褚為都尉，引入宿衛，諸從權侯皆皆為虎士，其後虎士以功為將軍封侯者數十人，任都尉校尉者百餘人(註五)是曹操之軍事幹部，出於許褚之門者幾二百人。許褚以禦寇聚衆於許，此二百人當多為曹中子弟，與曹操有親誼；其有鄉誼之二百人，散佈於其軍隊中，統率其部眾，其能發揚軍士戰鬥意志，舉軍忠誠，當非其他聚合之衆，所可比擬。故曹操之部眾在龍亢事變以後，鮮有以叛變聞者。

曹操首事之初，既能以有鄉誼族誼成體之部眾，為其基本軍力，再從而招募英才，為之輔助，故其部屬中又人才特盛。尤以曹操善用降將，其於呂布部將陳宮、張邈等，及降而復叛之糜鵠，盡力招致，其於呂布降將張登，及相繼降者張楊，楊奉降將徐晃，亦皆特予任用。蓋曹操深知用降兵不如用降將，降將之能治軍者，多能率其有節制之師，效命疆場也。故其機關降將之方法，或以恩德，或取其質之心，或以安危為去就，張遼陳宮之徒，因稟忠而歸降，或以昌黎之屬，亦能以勢危而難叛，安不如其基本軍部之是恃也。

曹操最初所居之根據地，既為四戰之區，故其作戰，當相閉守之方式，力求居於主動地位，其舉黃巾於壽張，擊袁術於匡亭及泗水入徐州，皆逐逼窮逐北之能事。其軍官渡之時，以劉備據下邳，即轉軍南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擊劉備。白馬之役，輕兵兼道而行，一舉即斬袁紹之大將顏良。烏巢襲糧之役，亦出敵之不意，潛師夜行，三百餘里，追至官渡長坂，盡獲其人衆輜重。凡此皆其閃擊戰術之戰果。惟此種戰術，必須有善疾動彈之將帥與士兵，始克收效。而曹操則以其部屬，多為親信之人，故能具備此種條件，勝則勇往直前，敗亦始終相隨。例如許褚所恃之虎士，於龜田之役，能奮勇先登，還關濟河之役，又獨留南岸戰後(註六)，即其明證。是以曹操常能保其將士堅強戰鬥意志，而有一自強以禦事之條件，反於地勢之險阻，視為無足依憑(註七)。

至若曹操所用文人，多有為漢官屬或其後裔者。荀彧之父荀悅，官至漢濟南相，叔荀爽在董卓當政時，曾被迫為司空；其父荀爽，在國相之間，知名當世；荀彧本人，亦曾為漢帝末年，舉孝廉，拜守官令。荀攸祖父荀爽，仕漢為廣陵太守；荀攸本人，亦於何進執政時，得拜黃門侍郎。曹剛在董卓時曾舉孝廉為郎，董卓入洛陽時，即以太尉掾員平津都尉，遷封廣後尉；獻帝在長安時，則官至光祿大夫宣議將軍。鍾繇之曾祖鍾離，在劉趙之間，與湘淵齊名，官至司徒掾；鍾繇本人，亦在魏國之興，舉孝廉，除尚書郎臨訟令，旋拜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等官。荀彧荀攸黃朗，為曹操軍中之重要謀士，鍾繇為鎮撫關西之巨吏，皆為漢官舊臣；他如袁術

魏範何靈勳助華欽王朗渡江鄭渾王鬆構修桓階陳羣
魏植杜高柔王凌之流，或為魏官後裔或本人曾任
漢職，蓋以曹操在政略上挾魏帝以自重，所用文吏
，自可仍用舊班，其勢至顯，固無足怪。

至若以所居文士之籍貫而言，則以豫州人為最，
其次為兗州人，其次為冀州人，其次為青州人，
其次為徐州人，其次為涼州人，其次為雍州人，
其次為并州人，其次為秦州人，其次為梁州人，
其次為益州人，其次為南蠻夷。

曹操之用人，又以豫州人為中心。荀彧自初平二年
歸曹操，自建安二年從征張繡，至建安十九年從征孫
權，多所參與。荀攸於建安元年漢獻帝遜位以後歸
曹操，自建安二年從征張繡，至建安十九年從征孫
權，亦參與或幾有十八年之久。郭嘉自建安
三年從征張繡起，至建安十二年從征烏丸，自
神機還，疾疫，雖享年不永，隨行軍次亦十年之久
，所獻計謀，與荀攸並著。鍾繇則建安元年隨漢獻
帝東歸，至大和四年薨，歷事曹操曹丕曹叡，前後
三十五年，其為曹操指關西之功最大；其次鍾繇
曾在曹操以後，均各位崇顯。陳羣則自建安三年受
曹操之許葬，至曹魏四年薨，亦歷事曹氏，有三十
八年之久；其子泰在正始以後，出將入相，顯輝於
一時，惟黨於司馬氏耳。又羽林監曹氏為曹操屯田
之策，曹操用其言，軍糧民食，皆得豐裕，其功亦
大。此數人者，皆籍隸豫州，且為魏佐曹操成其基
業之重要功臣；此外如杜襲陳羣辛毗郭嘉等皆籍隸
豫州人。豫州人所以特尊地位者，或因曹仁之祖父
曹暉為豫州太守，因而顯顯人士與魏魏曹氏，夙有
淵源之故。故曹操得曹氏為引用，而豫州人亦樂為曹
氏盡力也。至若因術或採用其策，因而奉其不生
，則更屬所深知之人，則更屬豫州人士入仕之最大原因
。故其為或從子，郭嘉陳羣皆或所推尊，杜襲鍾繇

亦合得助於或（註八）皆其明證。若非豫州人，而
為關州人所汲引之者，當亦為數甚多，例如杜襲之
為河東太守，出自荀彧之推舉；又陳羣魏延，皆陳
羣所荐舉；在當時尚或屬籍隸二人，有知人在。至
九）所荐舉而不見於傳記者，必大有人在。至若
樂欽之與杜襲超僅有通財計合為一家之誼，則樂
欽之仕進，又與樂二人有關，故當時必發曹魏軍政
機要之人，實可視豫州人為其中心。

且自東漢定都洛陽以來，中原人最盛，實絕在
冀州，曹魏使選汝南士大夫，曹操與荀彧等，亦有
汝南同多奇士之稱。而魏志所記人物，共在大江以
南者，僅有桓階為長沙臨湘人，其籍隸益州者，僅
有龐德為南安狹道人。「魏志所記人物，自諸葛亮
以次至楊戲止，有專傳者計五十六人，其籍隸豫州
計二十二二人，益州十八人，司隸五人，徐州幽州涼
州益州各二人，冀州青州兖州各一人，劉備久居涪
益，中州人士，從之者甚少。又據魏志所載，荆州
多於益州人，而荆州中又隸隸南陽者七人（黃忠
陳壽呂×李嚴王連許慈宗實），隸隸襄陽者四人（
龐統馬良楊儀向朗，屬隸在馬良傳內，未另計），
此二地之人，即占荆州二十二人之半數。雖云諸葛
亮久居南陽，屬隸為襄陽人，由其互相汲引之故，
同時亦足以證明人物之盛，以接近中原各地者為最
。又費禕與蔣琬齊名，在蜀居重要地位，禕為昭人
，屬今河南羅山縣，亦接近中原文化區）。至若
吳志所載人物，自劉繇（其子基仕吳）以次，將孫
氏宗族除外，有專傳者共五十九人，以揚州人為最
多，為數三十，徐州九人，豫州六人，青州五人，荆
州幽州兖州各二人，兖州益州司隸各一人。孫氏立

業江東，費禕費用，其部屬自以揚州人為最；然其
重要謀士，大抵世居長江以北，例如周瑜為廬江舒
人，張昭為彭人，諸葛瑾為蜀人，魯肅為臨淮人，呂
蒙為汝南人，惟陸遜為吳郡人，居長江以南。於
此又足證中原人物之盛，始為吳人所出之。於
此，若再分析魏志所載人物，自夏威權以次至管輅
止有專傳者（卷十九卷二十各王公傳外）共八十八
人，籍隸豫州者三十四人，籍隸兖州者十七人，籍隸
司隸者十五人，籍隸青州者八人，籍隸冀州者七人，
籍隸幽州者六人，籍隸涼州并州者各五人，
籍隸揚州者四人，籍隸益州者一人。其中豫州之
州人主獨居其半，雖云曹操本人籍隸豫州，而以豫
州實事，就地取才，所得固多，在地域上與之有特
殊關係；然曹操定冀州以後，當居鄴城，應能多用
冀州人，而冀州人在魏志有專傳者僅七人，足見
不全由曹操本人之關係，而此時文物之盛，以豫州
為最，亦為其原因之一。當書陳頤傳載：「解結為
制史，頤應對如流，結表其曰：豫州人士半天下
，此言非虛」；蓋自東漢定都洛陽，文化重心，由
西而東，豫州在洛陽東南，通途四通，風氣早開，
故自漢末以至晉初，豫州人士，名滿天下，而曹操
盡其引用之道，當為其推舉事業之重要因素也。

漢末人才，既以豫州二州為最盛，然當大亂之
時，多避豫州。如荀彧會避地冀州；荀攸求為鄴
郡太守，遠絕不得至久住荆州；袁實會避亂江淮間
；和洽社稷避亂毛玠王柔避亂荆州；何夔會避亂淮
南；陳羣會避亂益州，皆為豫州二州之四散者。又
司隸為兩漢京城所在，人物亦盛，如司馬芝之社稷
，魏會避亂荆州，常林會避亂上黨，楊俊會由京畿山

先哲的勤政精神

成惕軒

本文根據的材料，係以尙書爲中心，亦即據著「尙書新論」中之一節，以其足資今日從政者之激盪與啓發，特先爲整理刊布，以就正於時賢。（惕軒附識）

爾父界中山先生，以天縱之聖明，建革命之大業，首倡「知難行易」學說，以期革除一般人們畏難苟安，遇事畏縮的心理，從而養成奮行，夙夜匪懈的進取精神。蔣委員長近年更有「力行哲學」和「行的道理」的發明，這在在都發揚先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標義，實能在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上，開闢一種新的境界，創造一種新的風氣，振衰起敝，百世維新。其實「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古訓昭然，由來已久。我們從尙書的敘述裏，即可看出古代的政府對其政務的進行，特別注意於爭取時間，以及行動的表現：

乾，無時不以逸樂爲戒；
大禹謨云：「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無怠荒，四夷來王」；
皋陶謨云：「無敢逸欲有邦」；
五子之歌云：「謂有之，內作而荒，外作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湯誥云：「凡我造邦，無從違忒，無即備淫」；
伊訓云：「敢有復讎於宮，黷亂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信於嬖倖，時謂淫風……每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若有一於身，國必亡」；
太甲云：「王怒乃讒，視乃罔聞，無時逸豫，罔念厥命」；
盤庚云：「乃正厥位，緩受有衆，曰：『無敢逸豫，罔念厥命』」；
康誥云：「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康誥云：「德義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

酒誥云：「自成湯咸至紂，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樂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樂飲，肆在外服，饗甸男衛鄂伯，饗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於酒，惟不飲亦不暇」；
又云：「無惟厥縱淫逸於非彝，用燕喪威儀，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惟逸」；
無逸云：「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於逸於遊於田，以畀民惟正之供，無辜曰今日耽樂」；
多方云：「乃惟汝尚後王，逸厥德，圖厥政，不綱，天惟降時喪」；
周官云：「若虞政謀，勿勿荒政」；
周禮云：「辨其式時周公之職訓，能日孜孜，無敢逸豫」；
文侯之命云：「克康小民，無荒弗事」；
晏安乃散壽之媒，小德爲大德之累。古人特製「無逸」之書，致慎於勤，以此。因爲此心稍懈，即將日趨浮薄，甚至放蕩無歸，無所不爲。

三民主義半月刊

二七

所謂逸樂的範圍，包括廣博，舉凡宮室之美，妻妾之眾，錦衣玉食，聲色狗馬之好，靡不備而充，不一而足；而對這種之惡習，有一於此，即足以圖國家亡，身敗名裂！試舉數例，以資說明：

(1) 丹朱 益稷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務，傲慢是作，日夜相傾，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

(2) 太康 五子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矧罔弗及，有影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

(3) 義和 所征云：「惟時義和，頑覆厥德，亂於酒，畔官離次，傲援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暨奏鼓，奮夫馳，庶人走，擊和尸厥首，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4) 商紂 泰誓云：「今爾王受，沈湎胷色，散行暴虐，惟官塗毒，敗池修服，以殘害於爾百姓，淫亂靡常，臣下化之，朋家作仇，骨體相滅，……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上列的四個例子，考其滅亡之漸，由禍之因，均由安於逸樂之一念所致。語云：「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古人服官從政，曉知進退之不可常，故除消極的引為戒外，而在積極方面，則尤着重於勤勞的獎勵：

大禹謨云：「帝(舜)曰：格爾禹，朕宅重位，三十有載，維爾懋勤，罔惟不怠，懋朕師」；

又云：「帝曰：來禹，洪水做于，成允成功，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爾賢」；

盤庚云：「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勤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金縢云：「昔公(周公)勤勞王家」；

洛誥云：「惟公(周公)徯明光於上下，勳庸於四方，勞作穆穆，不迷文武勳教」；

堯仲之命云：「爾乃邁述自身，克勤無怠，以勳乃後」；

多方云：「謂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周官云：「戒爾卿士，功懋惟志，業廣惟勳」；

畢命云：「惟公(畢公)懋德，克勤小物」；

呂刑云：「今爾罔不由德日勳，爾罔或或不勳，這些都是對於勤勞的獎勵之辭，不惟君勉其臣，而且上下互相勸勵，一致努力：

召誥云：「上下勳恤」；

呂刑云：「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罔不惟德之勳」；

故爲君者則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皋陶謨)；「味爽丕顯，坐以待旦(太甲)。而爲臣者則曰：「予未得聞，思日贊贊朕哉」(皋陶謨)；「予思日孜孜」(益稷)。君臣這樣的「夙夜匪懈，不勳」(蕪蕪)，自然「明作有功」(洛誥)「百廢具舉」了。惟其如此，纔能締國粹於無窮，享壽年於彌永：

堯等，……雖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在位，爰知小人之微，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即甲之享國，五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這就是說勤勞無逸的人，得年必永，享國必廣；反之，好逸惡勞的人，得年必促，享國必暫。「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精神愈用而愈奮，神明雖久而不衰，這個真理，可以驗之於人生，亦可徵之於國運。

最後我想在古代政治上舉出兩個賢勞最著的人，作爲我們今日的模範：

(一) 大禹 益稷云：「禹曰：……予創若時，(按指丹朱朋淫傲虐而言，娶於塗山，辛壬亥甲，啓呱呱而泣，予亦予，惟荒度土功)。

(二) 文王 無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而微采薇，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宵旰慮勤，蠶桑國事，置皇家於不顧，欲飲食而未遑，這種孜孜汲汲，席不暇暖的事實表現，應會現在那些尸位素餐清談誤國的人，愧死入地！同時，我以為值此建國大業發軔的時候，國家所需要的人才，必以刻苦忍耐爲其條件，而爲之幹部

，更應本着「人生以服務爲目的」的遺教，恪恭「勤儉爲服務之本」的學訓，踴躍奮發，念茲在茲，以踐履實質來發揚先哲的勤政精神，以艱苦力行

來完全新中國的現代建設！

國父家世源流的新認識

彭澤益

國父孫中山先生是現代的一個革命偉人，已為輿論皆知，中外同欽。但是他的家世如何，確曾有人注意研究，然以文獻不足，語焉不詳。對此曾有人殊。繼而林先生近復見中山先生上世家譜，撰為「國父家世源流考」一書（三十一年十二月商務印書館初版），對中山先生家世系統，予以詳細論證，值此文獻既供，學術荒蕪之餘，有此成就，確是值得感佩的事。

中山先生一生致力於革命事業，歷苦奮鬥之精神，四十年如一日，未曾稍懈。然對其個人私事，從未深加致意，竊謂對家族的遺傳，即可以看出他「公爾忘私」偉大的精神。他的家世問題，亦以生前奔走國事，未遑多加注意，自屬意料中事。不過有一次中山先生和人家開會談及他的家世，因為有人說他生在火奴魯魯，他回答那人道：「其實我和我的近幾代祖，的確是生在學亭村裏的。不過我家住在那裏，既有數代。我們的家廟，却在東江的一個縣公村（Kung-Kun）裏。」（引見林百克 Paul Linker 孫逸仙傳記）大概這是中山先生借此一次地提到他的家世問題。以後就來見他作進一步的考究。

中山先生所說的這番話，也許是聽前人的傳說，却引起了不少追求真理的好奇者，向廣東東江一帶去調查，希望能發現有個縣公村的地方。本書

的作者鍾春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將近十年的工夫，他居然發現了這個村落。

因為由中山先生自述其家祠原在東江的縣公村，於是使一般研究中山先生家世缺乏資料的人，便附會他的先代派居東莞。但不知東莞為清代廣州府屬地，平日皆與南海、番禺、順德等縣並稱，所謂「南海東莞」。雖然地為東江最下游所經，依廣東習慣稱呼，自博羅惠陽，以至紫金、河源、龍川等縣雖稱東江屬縣。如果中山先生上世確居東莞，當即直稱，不必再冠以東江一詞，這是第一點。其次，Kung-Kun 譯音京莞，亦不符合。或譯為「公館」，則較妥貼。按廣東境內以「公館」為地名者，南路合浦縣東部有公館墟，東江紫金縣忠通舊有公館村。前者與中山先生所說的方位不合，後者方位則較為相符。鍾春林先生於是就此地為假設之根據，數函紫金縣，多方調查詢問，後並得友人協助，途在紫金忠通（俗稱中心墟）發見「孫氏光緒二年重修族譜」一寫鈔本。證實中山先生上世源出于廣東紫金忠通公館村。同時其中所載十二世祖連昌公，名諱與年代，適與中山先生家藏「孫氏列祖生履紀念簿」相符，而自連昌公以上，各世名諱，及其由中原南遷之情由，循跡考求，於是系統緒然了。茲為便于讀者獲得明確之概念起見，特將中山先生家世源流條列如下：

始祖考文於百三十三郎

始祖母羅人八十娘
友松公與弟友壽公，於明永樂間由閩遷粵永安上鎮約，即今紫金縣忠通居住。生四子：長敬忠，次惠忠，三勳忠，四榮忠。

二世祖考敬忠公

敬忠公分仕忠瑞上排祠堂，即今孫屋排。生二子：長承久，次承良。

三世祖考永良公

永良公生一子：懷文。

四世祖考懷文公

懷文公生一子：鳳宗。

五世祖考鳳宗公

鳳宗公生一子，明高。

六世祖考明高公

明高公生一子，仕伯。

七世祖考仕伯公

仕伯公生二子：長耀宗，次紹宗。

八世祖考紹宗公

紹宗公生一子，何福人。

九世祖考何福人

何福人，何福人。

九世祖考乃和公

乃和公生一子，宗榮。

十世祖考宗榮公

宗榮公生三子：長則茂，次通昌，三鼎山。

十一世祖考通昌公

通昌公生三子：長通盛，次通昌，三通壽。

十二世祖考通壽公

通壽公生歷歷八年，卒雍正六年。於歷歷中

立業。生子通千。

十三世祖考通千公

通千公生歷歷四十年，卒乾隆十七年。生一子，殿朝。

十四世祖考殿朝公

殿朝公生乾隆十年，卒乾隆五十八年。於乾

隆中泰，再遷翠亨村開基。生一子，恆輝。

十五世祖考恆輝公

恆輝公生乾隆三十二年，卒嘉慶六年。生一子，敬賢。

十六世祖考敬賢公

敬賢公生乾隆五十三年，卒道光二十九年。生三子：長建威，次學成，三觀成。

十七世祖考建威公

建威公生嘉慶十八年，卒光緒十四年。生三

子：長德彰，字壽屏；次德裕；三德明，即國父。名文，字逸仙，號中山。

十八世祖夫人盧氏

國父生同治五年，卒民國十一年。盧夫人生子科，字哲生，即今立法院長。

十九世夫人陳氏

生子治平，治強。

二十世治平

編容林先生在歷史科學上的探險精神，一向為我們所敬佩。這次他被見一個革命偉人的家世，起先自然是有一段艱苦的經歷，而後才能得到成功，却也是快慰而收效。至少在遺本管中可以表顯他努力的貢獻。

第一、就中山先生家世問題本身的研究上說，他推翻了近人所述中山先生上世源出東莞說之說，並證明左瑛孫氏族譜與中山先生上世之無涉，至於曾德公為中山先生上世入粵始祖之說，更是無據，自不足信。他以發見之可靠的新資料，證實中山先生上世源出于廣東紫金縣忠瑞公館背，自其入粵始祖友繼公於明永樂年間自閩遷粵紫金縣後，至中山先生祖傳十八代，各代之名諱世次，皆其明確。自其祖公至十一世祖淵公，均住紫金忠瑞，以淵公一支，嘗開基于忠瑞公館背，因此，中山先生說他的家祖是在東江上之 Kuan Kuan 村。自其十二世祖連公在康熙年間由紫金縣遷居增城，不久又遷至中山縣涌口門村，至十四世祖殿朝公，又自涌口門村遷居翠亨，至中山先生本身，適傳五代

110

。故中山先生說他的現代近源，皆住翠亨，就是個道理。至于遷世源流，唐以前均住河南陳留縣，為中原世族。自唐黃巢之亂，遂遷居江西鄱陽，五代至宋，因子孫繁多，乃散佈于贛南閩南等地。元明之際，始多自閩遷粵。中山先生入粵始祖友繼公，就是自福建長汀河陽遷粵的一支。雖然自上世入粵始祖以還，其各代之名諱事蹟，因資料不備，未能明述，尚待探討。要之對中山先生家世源流，亦已究明梗概。

第二、就家譜學研究的意義上說。不外是究明一個人的傳襲關係。連正對孫哲生先生序「國父家世源流考」中所說：「中土重親宗世研究，由來久矣。此蓋以纂述世系，辨識考妣，則于先人之盛衰消長，與其氣宇魄力，皆可究其真際，明其傳襲，而此其先人適以生存演進之美質，勉自奮勵，為之奮揚光大，則其為益於人羣社會，必愈進愈增。而總集入其譜乘，為之歸納，則大之足以開揚全民氣宇魄力剛柔風韻之由來，小之足以闡明優生遺傳諸學之取證，與探述人物專史之參稽也。」以中山先生家世言，其上世皆耕讀傳家，富有自強不息之德操美德，且遜民習于弘毅和齊與奮發有為之精神，並以父母行誼，薰陶感召，乃養成中山先生偉大之品格，進取之態度，奮鬥博大的精神，而成其偉大之學問與事業。這完全為接受優良傳襲之影響。

第三、就中山先生革命思想之淵源來說，其上世之輾轉遷徙，實與當日時局變遷有關。他的祖淵公，因黃巢之亂，以領兵增崇之故，乃遷江西尋都。他的十二世祖連公之遷居廣東增城，則與其上世參加抗清義師有關。其自增城遷居中山縣涌口

煽動，聲如洪鐘，喜氣狂歌，年十九，讀黃梨洲，原君篇，慨然曰：「予制不假，民無得而幸焉！」與同里胡祖舜友善，胡與何來保為中表親，何來保者，曾於湘西謀響應唐才常起事漢口未成而被捕者也。以是得窺何所藏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前種族革命之志益堅，遂自號武陵哭生。旋畢業鄂軍小學，適俄肆虐東三省，與胡祖舜上書湘撫趙爾巽，請組織學生義勇隊北上，趙不報，紀元前八年秋，黃興謀起義長沙，宋教仁將以湘西響應，免激報警書局募股金，以為兵用資，事洩，宋教仁走日本，常德知府朱其藩索免激急，乃與祖舜變服易名匿僻鄉。翌年，東渡日本，入同盟會，值取締私費留學生，覃振約之與祖舜海峽揚州等處回長沙組織革命機關，與陳天華禹之謨姚安業諸議岳陽山，湘護進驅鴻書掃之，以無左證釋。紀元前三年，入湖北新軍，創文學社為運動新軍機關。辛亥八月十八日夜，孫武製炸彈於漢口俄租界，不慎，爆炸，傷面，警後門以巾掩頭入日人所設同仁醫院，追候警至，拘人不得，悉取所藏文告簿書以去，報武昌巡警道，漢口各機關於是被破者數處，武昌閉門大索，新軍人人自危，聲氣又不能通，遂各自為謀，無何，楊安勝被捕於文學社，彭楚藩出憲兵營，免，畏死貪生，先飲若酒，使若無生可食也。楚藩止之，將整紙下令，總騎至，免激挺身出，帥以彈，未炸，被執，胡祖舜趨走，為後門邏者得，彭楚藩跳牆傷頭，故不免。楚藩服憲兵服，成性意

之，故頗此乘間進，鄂都瑞瀾親衛，免激罵之，成以嚴刑，不吐一詞，與楚藩宏勝同就斃於督署外。楊安勝，湖北襄陽人，設酒肆於湖北陸軍第八鎮營門外，擔任俠，廣交遊，幼讀水滸傳，慕朱貴之為人，故所結皆皆江湖志士，與劉免激彭楚藩相友善，因識居正，孫武，劉公，胡瑛，劉敬安等。得聞革命之義，頗醉心焉，排滿之志尤急切，黨人多會於此，炸彈槍械，藏於其家。聞漢口機關破，急趨文學社，商發動，甫至社，為邏者捕，錢良凱之，不吐一詞，惟太息曰：「天乎！天乎！何不佑漢若此，殆虞運尚未絕耶？」錢良命卒觀之，笑曰：「余死且不懼，草履何足辭？」挺身受之，傷遍體，無完膚，神色自若，惟視座上劉激錢良曰：「死而有知，當為厲鬼，義殺滿奴，不違一種」。臨刑，大呼曰：「孫中山及未死同志，萬歲！萬歲！」聞者淚淚。

贊曰：「荆湘之間，湖澤岳峙，山川勁氣，旖旎俊賢，革命大業，有開必先，常山斷舌，侍中絕絃，浩然磅礴，泣鬼神天，成仁取義，漢體激歷，蛇山雷轟，英雄輩焉！」

註：本傳所取資料 鄧魯齋史稿 漢族光復史（三戶遺民印鴻書局印） 辛亥湖北光復記（陳春生訪稿） 湖北督署審訊錄 湘湖百事 張維先撰劉敬安傳 吳應漢武光復三日記

編輯及發行者

三民主義半月刊社

重慶兩洋支路八十三號

印刷者 南方印書館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

各地航空版：

昆明版 昆明朝報館

宋陽版 宋陽湖南青年團支部

西安版 西安陝西青年團支部

贛州版 贛州江西青年團支部

立煌版 立煌安徽青年團支部

恩施版 恩施湖北青年團支部

訂購辦法：

零售 每冊壹元

訂閱 半年拾元

為員團員學生軍人圖書館八折優待

郵費半年壹元貳角

書店經銷 優待七折

集體訂閱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七二六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

東川郵政管理局第八五九號執照

集體證警字第九八三號